“局内”与“局外”：参与观察的反思

朱凌飞

〔摘要〕 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参与观察法的核心命题在于研究者需在“局内人”“局外人”之间构建并维系动态的平衡。该方法通过身份转换、社会网络嵌入、文化习得与移情等实践路径，使研究者得以深度浸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场域，获取基于内部视角的文化理解。同时，研究者又需要通过保持专业距离与持续的反身性思考，确保观察过程的客观性与理论分析的深度。研究实践中，主体间性互动、伦理困境及观察者效应等议题始终贯穿其中，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在参与观察中进行反思，也需要对参与观察本身进行反思。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参与观察的“田野点”已从传统物理空间拓展至线上线下交融的混合场域，这既对研究者的传统田野技艺与数字素养形成双重挑战，也为该方法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空间。

〔关键词〕 参与观察；局内人/局外人；主体间性；数智时代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 (2026) 01－0138－09

导言

布迪厄相信：“搜集资料的活动——或更准确地说，是生产数据资料的活动——的实践组织和开展工作，是与对象的理论构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不能被降低为由受雇的打下手的人、政府的调研官员或研究助手从事的‘技术性’工作。”①资料收集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工作，卢尔曼（Tanya Marie Luhrmann）所说“世界上最细致的观察和倾听实践”②的民族志，也正是通过“参与观察”实现的。

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美国女作家哈珀·李（Harper Lee）借阿蒂克斯之口说道：“你不可能真正了解谁，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陪他走上一段”。③民族学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要求研究者不仅作为

〔作者简介〕朱凌飞（1976—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 65009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道路基础设施推动西南边疆现代化建设进路研究”（23AMZ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2JJD840004）

①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② T. M. Luhrmann，“Mind and Spirit：A Comparative Theory About Representation of Mind and the Experience of Spirit，”*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 26，2020，pp. 9-27.

③ 此处为意译，原文为：“You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 person until you consider things from his point of view ，until you climb into his skin and walk around in it.”参见Harper Lee，*To Kill a Mockingbird*，New York：Popular Library，Inc.，1962，p. 34.

“局外人”，更要深入到调查对象的生活情境中，通过亲身参与其日常活动，以“局内人”的视角去体验、理解和诠释其文化逻辑、行为动机和深层意义，从而超越表面的数字、口号或话语，捕捉到那些习以为常的“隐藏规则”和难以言说的真实情感，发现那些与理论预设相悖却具有关键价值的经验事实。王国维所言：“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道出了田野工作的精髓。在“内”与“外”之间的平衡，能够“入乎其内”并可以“出乎其外”，也正是参与观察的要旨与艺术。

从本质上看，参与观察就是对田野中各种事项的身体力行，具有显著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项飙等认为，身体可以成为“研究工具”，其核心在于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身体经验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维度。②也就意味着，研究者不仅要正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必然要强调作为研究工具的自己作为“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因而，民族志研究除了在参与观察中进行反思，也需要对参与观察本身进行反思。

一、成为“局内人”

参与观察法的核心就是研究者要融入研究对象的群体，获取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观察到真实的社会互动与行为模式。在参与观察中成为“局内人”，是研究者突破“他者”身份、获取真实社会知识的关键挑战。这一过程不仅依赖方法论技巧，更涉及身份转换、文化习得与情感联结的深层实践。保罗·拉比诺在对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中提出：“在观察与参与这二极的辩证对立中，参与改变着人类学家并指引他走向新的观察，而新观察又改变着他如何参与，但这种辩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是由起点所掌控的，而这起点是观察。”③需强调的是，观察虽是起点，却非终点，参与观察的深度实践还将为访谈、文献收集等其他田野技术的运用创造基础条件。

（一）身份转换：从“外来者”到“自己人”

研究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田野。但“进入”田野并不仅仅意味着在当地“住下来”，而是要在空间、社会、文化等层面上与当地人建立深度联结，实现从“外来者”向“自己人”的身份转换。寻求“中间人”支持是常用策略，如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的调查中出现的中间人就包括莫里斯·理查德、易卜拉欣、阿里、麦基、拉什德、马里克、本·穆罕穆德等，他们仿若一道道“文化桥梁”，将拉比诺一步步引入到摩洛哥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核心场域。④此外，在进入田野之初，争取当地权威人物（如地方干部、宗族族长、企业主管、社团领袖）等的信任和支持，借助其社会网络与影响力获得社区的初步认可，可有效降低“外来者”身份的疏离感，为后续融入奠定基础。

真正的“接纳”意味着研究者被研究对象视为“自己人”，而遵循当地礼仪、习俗、禁忌与“规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如刘绍华在四川凉山地区的调查中对诺苏人的“鬼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愿意（胆敢）跟着他们一起去看“鬼屋”，而在她“见鬼”的故事传开之后，她发现自己似乎已经被当地人当作“自己人”了。⑤又如格尔兹夫妇在巴厘岛的一个村子里围观斗鸡赌博时遭遇警方突袭，两人跟着赌客和众人一起四散奔逃，事后莫名其妙地被当地人认作“自己人”了，他说：“我们不仅不再被视而不见，甚至突然间成了所有人注意的中心，成了热情、兴趣特别是快乐大量倾注的对象”。这成为其田野调查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已经“身在其中”（in）了，“整个村子都对我们开放了”。⑥虽然这些被接纳的经历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但研究者只要“有心”，就有可能找到“进入”田野的机会。如礼物馈赠，可适当准备一些当地人喜闻乐见的食物或用品作为第一次登门拜访时的伴手礼，可以快速拉近彼此的距离；又如在参加当地人家的红白事时，可以跟着其他客人一起随份子，让自己的名字也被记录在主人家的礼簿上而与当地人开始“礼尚往来”，对于融入人群中也是极有帮助的。

---

① 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4页。
② 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③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5页。
④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第147—153页。
⑤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11页。
⑥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88、489页。

在“进入”田野并试图成为调查对象中的一员时，研究者还需要考虑自己在该群体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在初期可以考虑那些相对边缘性的角色，如志愿者、实习生或事务助理等。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特长或专业技能，尽量让自己在社区中显得“有用”，如擅长电脑操作或互联网的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信息技术方面的服务，外语水平过硬的人不妨试着去帮助家长辅导孩子的外语学习。即使没有特别的专业技能，研究者也可以在社区中或住户家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性事务，如家务、农活或只是打打下手。如项飙在“浙江村”的调查中就曾通过充当临时文书、社工小组负责人、企业顾问等“帮忙”的方式“在互动中认识对方”。①本质而言，“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实践姿态，是促使当地人“把你当自己人”的重要前提。

（二）嵌入网络：社会联结的建构与拓展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社会个体作为节点而成为网络的组成部分，并与网络中其他个体形成不同方式的联结。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田野点之后，研究者只要与其中某个节点形成联结，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与整个网络建立了关系，并可通过这个网络而与其中的某节点即个体进行互动。成为网络中的一员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对地方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参与了。

作为地方社会网络体系中的一员进行参与观察，研究者首先需要明确自己在网络中所处的“节点地位”。在初入田野之时，介绍人或中间人的节点属性往往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的地位，成为其他社区成员判断其身份角色的重要依据。在开弦弓村调查时，因其姊费达生在当地推广蚕丝业改革而广受赞誉，费孝通较为顺利地获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支持。费孝通曾说道：“我的姊姊曾在这地方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的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十多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的方便。”②村民周正华也说道：“村里人当时不认识费孝通，但都熟悉他的姐姐费达生。听说他是费达生的弟弟，大家都对他很亲热。他虽然是城里来的有学问的先生，但是人却比较随和，大家比较愿意和他聊天。”③反之，保罗·拉比诺就曾因其与“声誉不佳”的资讯人阿里的密切关系而被拒绝进入西迪·拉赫森村④，笔者也曾在某次田野中因为向导与村民之间长久的隔阂而遭受当地人的冷遇甚至误解。需注意的是，社会网络具有动态性，随着田野时间的延续，研究者将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认识社区中不同的个体，并有意识地选择那些信息资源丰富的人作为自己的关键报道人，融入更深层次、不同范畴的网络结构之中，甚而获得“多重局内人”的地位。实际上，这一不断融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渐深入参与的过程，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地方社会网络结构的机会。

在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之中，研究者尤其需要注重对各种关系的动态平衡，一方面避免过度依赖某一类关系而忽略其他关系，甚而造成其他群体对自己的排斥；另一方面要避免被某种关系所主导，失去学术自主性，甚而成为某些人实现其意图和利益的工具。

（三）文化习得：隐性规则的解码与实践

即便研究者被当地人视为“自己人”，其是否真正实现“局内人”的认知转换，关键在于是否“习得”当地文化的核心逻辑。对于“他者”的文化，研究者不一定如保罗·拉比诺的同事所宣称的“避免不相信”⑤，不必对异文化“心悦诚服”，但需要一定程度的把握、理解、尊重，只有如此才能有信心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的“自己人”。

语言是文化习得的核心载体。掌握当地语言不仅是田野调查中的必需技能和实在工具，使用当地人的语言还可以快速拉近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容易得到对方的认可与接纳。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而言，语言更是一套符号系统，是通向当地人的思维模式、社会规范、身份建构、权力关系等的重要路径，可以让研究者“听”到更多的内容。如熟知当地语言的马凌诺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库拉”咒语的语言学考察中就发现，当地人认为某些词语具有巫术的力量，“土著人对咒语灵效的

---

①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9—32页。

② 费孝通：《芳草茵茵——费孝通自选田野笔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8页。

③ 顾星欣：《“费先生”与他的江村情结》，《新华日报》2021年9月24日，第17版。

④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第78、82页。

⑤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第57页。

信仰，导致了咒语无论在意义方面或音响方面的各种特殊处理”。①而笔者则因为不懂普米语，在当地人的“祭三脚”“退口舌”“给羊子”等重要仪式中错失了很多关键信息，这一经验也印证了语言习得的重要性。此外，还有那些非语言符号，如手势、姿势、表情等也是一种隐含的表达方式，其中蕴含的信息、情绪、氛围等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在长期深入地参与观察之后才能把握，也只有在明白其中奥义之后才能找到更好的参与时机。例如在社区聚会中选择合适的座位坐下来、在对话中保持或打破沉默、运用符合当地规范的身体语言，都是文化习得的实践体现。

习得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入乡随俗”。对于那些带来“文化震撼”的习俗、礼仪、禁忌或言行风格，研究者可以在观察中不断了解，通过问询而深入理解，并在对具体事务“循规蹈矩”的参与中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以更好地融入群体生活。此外，研究者如果能主动学习当地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某项技能，也是主动向他们靠拢的有效策略，如果能运用这项技能与他们一起劳动（如插秧、割胶、做手工艺）或娱乐（如唱歌、跳舞、游戏），不仅能让研究对象产生认同感，更能使研究者具身体验其生活中的艰辛与快乐，建立情感共鸣，并获得田野工作的成就感与意义感。

（四）文化移情：情感纽带的建立与深化

马凌诺斯基强调对土著行为的细致观察，其核心目标就是要把握“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进而实现对土著生活的移情理解。②格尔兹同样主张移情，认为人类学家需要在参与观察中体验、理解、阐释地方文化，并提出了“近经验”（experience-near）和“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③相并置的研究策略。

移情具有内部性，因而必须在知觉层面上进行某种“刻意为之”的努力，如雷尔夫认为：“需要人自愿地朝某个地方所具有的意义敞开自己，去感受它、认识它，并欣赏它的符号与它的象征意义”。④同时，移情还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如克罗斯利就认为：“为了移情他者，我们需要将他们置于一个故事之中，这个故事能让我们在想象中、在某些片段中使自己成为主角。移情要求有一个情节，一个可理解的事件序列，使我们在其中可以跟随其节奏，将自己置于主角地位”。⑤本质而言，移情是一个研究者“进入他者视角”的感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另一个人，感觉自己进入了别人的思想，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把自己放在他人的角度去想象、去感知、去行动”。⑥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将“有助于研究者将基本的信仰、恐惧、希望和期待融为己有”。⑦需补充的是，移情是一个双向过程。研究者应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观察研究对象之时，他们也在观察自己并可能对自己感兴趣，因而在日常的交流互动中不妨适度表露自我，如个人工作上的难题、学业中的困境等。同样，也允许研究对象向自己提问，在打破单向凝视、重构平等对话关系的同时，促使研究对象对研究者产生一定程度的移情，形成双向的情感纽带。

在田野调查过程之中更容易使研究者达成移情的场景，通常是那些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事件，如葬礼、婚礼、节庆等。在此类情境下的参与观察，除了那些具体的仪式过程、工具和用品之外，人们的情绪及现场的氛围尤其需要重视，而研究者在观察和体验之余，也需要对自己的情感生成及其表达方式进行必要的调适，避免因文化差异引发误解。通过移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得以形成更深层次的“一体感”，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局内人”。

二、做回“局外人”

不管参与程度多深，研究者即使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生活中的一个“看客”，但始终只能是一个“过客”。“研究者”的标签始终贴在他们身上并被研究对象看在眼里。在某些时候研究者必须要“抽身而

---

① 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② 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第13—16页。
③ 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9—74页。
④ 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0—91页。
⑤ 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刘军、孙晓娥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6页。
⑥ 郑日昌、李占宏：《共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年第4期。
⑦ 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出”，而在某一时刻则需要“全身而退”，即使某一天有可能“故地重游”，这实际上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常态，也是学术研究工作的必需。

（一）观察者角色：在“内”与“外”之间保持张力

保罗·拉比诺在对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中意识到，“无论一个人在参与的方向上走多远，他依然是个局外人和观察者，这点是毋庸置疑的”。[①]大卫·费特曼也特别提醒，参与观察不但要参与被研究群体的生活，还要保持专业距离以便适度地观察和记录资料。[②]这些观点并非否定参与的价值，而是强调观察的核心地位，参与是为了更深入地观察，而观察则需依托专业理性对参与经验进行提炼与分析。

需要明确的是，“成为局内人”虽是获取真实经验的路径，但并非最终目标。研究者既“无法”也“不需要”完全成为当地人。从“无法”层面看，研究者的成长背景、价值观念与职业身份，决定了其即便深度融入，也始终存在“文化根性”的差异，且最终需脱离田野回归原来的生活场域；从“不需要”层面看，适度的“距离感”是运用学科理论与概念工具对田野经验进行学理化阐释的前提。具体实践中，研究者初入田野时可能对当地人的某些观念和行为感到震惊和不适，这种“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可能使其对该文化充满学术兴趣并引起一探究竟的热情。但当研究者逐渐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一切可能会变得平淡无奇并逐渐“习以为常”，乃至于最终对其“熟视无睹”，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此时，研究者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从具体的情景中“抽离”出来，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陌生化”，如可以通过查阅前期的田野日志对田野过程中曾经存在的“惊奇”进行回顾，或与田野之外的团队成员（如同事、同学或导师等）讨论田野中的情感困境，又或者每隔一段时间离开田野点返回城市整理笔记。当然也可以尝试在民族学人类学的“工具箱”中翻找那些能够“指点迷津”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审视自己已经掌握或正在经历的事物，找回或重构学术兴奋点。

此外，研究者需正视“局内人”身份的不稳定性，即便已被接纳，仍可能遭遇疏远、排斥或拒绝。这种情况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并不少见，也不难理解，因为即使是研究对象群体中的不同成员之间也存在亲疏远近之分，也有利益争执和矛盾冲突，更何况一个外来的研究者？研究者需认识到，“局内人”身份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存在反复性与阶段性，因此“入内”与“出外”的交替反复，应被视为参与观察的正常状态。

（二）保持专业距离：反身性的实践策略

“参与”与“疏离”的动态平衡是田野工作的核心挑战。雷尔夫同意移情的价值，但也提出需要注意移情的程度问题。在田野调查中，“人类学者将自身的行为与情感都投入了进去，却依然保持着客观意识，不让自己完全成为文化中的一员。”[③]这一观点指向反身性实践的核心，也即研究者需持续反思自身在田野中的角色、立场与偏见，避免“过度移情”导致的认知偏差。

即使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研究者，在进入研究对象社会文化之中后，不管如何强调“客观”“中立”或所谓“价值无涉”，但其在成长过程和原有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乃至日常习惯等，都使其在田野过程中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疏离”，如保罗·拉比诺[④]或奈吉尔·巴利[⑤]在田野中的遭遇所揭示的一样。如前所述这种“疏离”也是必需的，但仍然提醒研究者要不时调整研究策略并不断反思自身处境，使这种“疏离”保持在合理且必要的范围之内，并也坦然承认自己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距离的影响，进而揭示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在具体实践中，“保持专业距离”的意识应该贯穿田野调查的始终。在初入田野阶段，应开诚布公地向研究对象表明自己的调查目的，如“我来学习和研究你们的文化，最后要写成学术论文”，避免因身份模糊可能导致的误解以及双方的过度依赖。在调查过程中，对于那些涉及群体内纠纷、利益冲突，或者无法分辨是非的事物，不宜过度介入，最为明智的做法是“置身事外”，避免树敌或卷入争端。尤其是对于那些与自己的价值观念明显相悖，甚至有可能危害人身安全或违反法律法规的事物（如吸毒、暴力等），可以进行非参与

---

①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第84—85页。

② 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第42页。

③ 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译，第84页。

④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

⑤ 奈杰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何颖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观察或通过第三方途径去了解，绝不可尝试或“体验”。

需注意的是，“合理距离”并无固定标准，需根据研究阶段、对象特性与理论目标动态调整。“远”与“近”的张力本身即是知识生产的动力。通过持续校准距离，研究者既可避免“冷漠局外人”的偏见，又能摆脱“天真局内人”的盲视，在参与与疏离的辩证中逼近对经验事实的深刻理解。

（三）告别田野：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不管时间长短，田野调查也总有结束的时候；不管愿不愿意，告别终将来临。对研究者而言，告别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是身份与情感的转换。研究者将从当地群体生活中的“局内人”回归专业领域中的“研究者”，从情感沉浸转向理性分析。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情绪，但对学术研究与个人成长均具有关键意义。

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在田野中长期参与观察，不仅仅是完成了一项预定的调查任务，而且是经历了另外一种文化情境。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这种“结束”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者摆脱了田野中各种事务的烦扰或情感的羁绊，能够更为冷静和理性地对所获取的资料展开理论探讨，且研究者曾经“在那里”（been there）所提供的情境性也为其论著增加了说服力。实际上，一个经验丰富的民族志学者在其田野工作过程中就已经对归去后的写作进行了充分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在田野期间的参与观察策略——为了“离开”而“进入”。对于个人生活来说，田野经历为研究者的人生留下了一个烙印，那些关于田野工作对于研究者是否有影响的明确反思已屡见不鲜，不管观点如何，在田野中受到关爱、包容或者遭遇挫折、创伤的经历，都是研究者不可轻易抹去的印记，这种印记不仅让其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去评判曾经的田野生活并呈现参与观察的经验，同时也可能让研究者以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生活，甚至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这当然也是参与观察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与观察实际上是研究者与当地人两种生活经验的并置和构连，“关注于生活、关注于个人如何看待其生命，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其经验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出新的知识以及威廉斯所说的‘认知的震撼’（shock of recognition）”。①离开田野并不意味着这种经验的构连已经中断，而是以另外一种想象不到的方式存在，并成为下次参与观察的新的出发点。

参与，让研究者能够更切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同时，观察所需要的理性和反思，又要求研究者随时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因此，好的参与观察者，善于在亲熟和距离、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保持某种有意识的平衡。②最终，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既因深度参与而“熟悉”，又因身份差异而“陌生”，这可能是参与观察法最好的结果，也是其方法论精髓的集中体现。

三、“内-外”之间的困境

对于研究者而言，田野调查意味着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方式生活，而参与观察则是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主动建构，这种关系始终嵌入特定的伦理框架与权力结构中。除田野工作的共性伦理（如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外，参与观察还面临观察者效应、主体间性关系、“情感负债”等特殊困境，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反思。

（一）观察者效应：从“干扰”到“建言”

参与观察常被简化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表述虽未完整呈现其方法论意义，但也较为直观地反映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密切互动，如饮食偏好、卫生习惯、生活规律等的琐碎细节，均可能成为矛盾导火索，甚至导致田野工作中断。对此，除涉及安全或原则的问题（如饮酒）外，研究者需以包容态度尽可能适应，这是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

在这种共同的生活中，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的“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③是一个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作为贸然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外来者，当地人会根据对研究者预期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言

---

① 安·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许梦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② 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著：《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③ Margaret D. Lecompte and Judith Preissle Goetz, “Problem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 52, no. 1, 1982, pp. 31-60.

行举止，如表现礼貌、保守或更“合理”的一面，甚或改变群体原有的互动模式，如冲突处理、合作机制或决策过程等。当地人的这种“改变”并非自然发生，不仅使研究者无法更有效地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甚至有可能对群体将来的发展变迁产生潜在的影响。笔者主张，如果无法完全消除这种“观察者效应”，那不妨有意识地将其导向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朝应用研究更迈进一步。正如詹姆斯·皮科克所认为的：“无论被追求的题目多有学术性，如果它是与民族志者和当地人共同阐释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起被追求的，他的研究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学必然是‘应用的’”。①这意味着研究者需正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将观察过程中的“干扰”转化为为解决群体实际问题而进行“建言”的契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在田野工作过程中协助社区整理文化资料、开展技能培训，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尝试将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的共性问题撰写成咨询报告并提交相关职能部门，以期为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需稍作补充的是，“观察者效应”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并非毫无意义。莫纳汉和费希尔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偶然性和片面性，参与观察的最大优势在于与研究对象建立紧密联系并协同塑造田野中的话语与实践，并进而对“民族志比其他研究方法更不客观”的说法提出质疑。②因而，研究对象在“被观察”过程中的表现，无论是为研究者刻意“表演”，还是被研究者所“干扰”，往往都能揭示有关社会或文化的深刻真相。

（二）主体间性关系：从“单向研究”到“合作建构”

后现代民族志对知识生产的反思表明，研究者在参与观察中所获取的田野资料，甚或对其所展开的民族志阐释，在某种意义上并非由其独立完成，而是包含了研究对象的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涉及“研究者-研究对象”与“文本-现实”两个层面的主体间性互动。

在“研究者-研究对象”层面，二者是合作关系而非单向的“研究-被研究”关系。皮科克提出，田野工作中的“关系”优先于纯粹的知识，民族志学者学会的并不只是合作者复述的客观“事实”，还有与合作者的关系③，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共谋”关系。除此之外，有的研究者还会与其研究对象共同撰写最终成果，即使这些成果多由研究者本人“执笔”，但仍然在“作者”位置署上了研究对象的姓名，这种做法自然是对研究对象贡献的认可和权益的尊重。那些没有署上研究对象姓名的著述，通常也会在内文中特别注明某些事实或观点来源于哪一位研究对象，其中也隐含着对著述的研究内容真实性及观点准确性的备注。格尔兹曾追问“在人类学中‘作者’意味着什么?”并强调“‘谁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④需补充的是，“在何种情境下说”同样重要，研究者需在文本中呈现参与观察的具体过程，阐明何种事件、何种在场状态促使研究对象作出如此表述，从而完整呈现知识生产的情境性。

在“文本-现实”层面，民族志知识是对现实生活的重组与想象。克利福德已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他认为：“民族志写作可以被正确地称为虚构，在‘制造或塑造出来的东西’的意义上”⑤，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真实的虚构”，是研究者基于田野经验，通过理论工具对现实进行的解码与重新编码，这一过程既依赖田野资料，也受“研究者-研究对象”互动关系的深刻影响。

（三）“无以为报”的焦虑

在参与观察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难免建立起某种形式的亲密关系，并作为一个外来者而可能受到当地人的诸多关照和帮助。这种善意使研究者心怀感激，但其明确的学者身份和研究目的，却往往使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困境或难题束手无策，付给资讯人或访谈对象的象征性酬劳并不能消解“无

---

① 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② Torin Monahan and Jill A. Fisher, “Benefits of ‘Observer Effects’: Lessons from the Field,” *Qualitative Research*, vol. 10, no. 3, 2010, pp. 357-376.

③ 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汪丽华译，第138页。

④ 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⑤ 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页。

以为报”的歉疚感。不少学者或研究生都或多或少地表达过此种感受，说明这种焦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根源在于参与观察中的权力关系、文化差异和情感联结的交织。

保罗·拉比诺曾坦言：“如果说人类学家的伦理角色含糊不清的话，那么无论是什么理由，他作为社会改良家的角色本质上更不合格。”①但这并非说明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对当地人毫无价值，且不说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开弦弓村”②和林耀华《金翼》中的“黄村”③因他们的研究而蜚声海内外，成为知名文化地标，而如刘绍华④、张鹂⑤、麦高登⑥等为自己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研究对象“去污名化”的努力也推动社会改善了对特定群体的认知。笔者曾将对普米族村寨玉狮场村道路问题研究的学术论文打印给村干部，成为村民争取修路支持的“论证材料”，此外也曾介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当地村民，为他们提供一个“为自己发声”的机会。⑦这些案例表明，学术研究虽非直接的“社会干预”，但仍可能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

需强调的是，此类影响本质上是学术研究的“副产品”，研究者不可将其作为获取信任的“交换条件”。在实践中，研究者需坦然承认田野关系的暂时性与权力的不平等性，明确告知自身能力的局限性，避免为获取合作而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如“帮你们解决资金问题”“推动政策改变”）。同时，可通过长期跟踪回访、分享研究成果（如笔者就曾将民族志著作赠送给每户村民）等方式，维系与研究对象的良性互动，以更可持续的方式回应情感负债。

四、余论：数智时代参与观察的挑战与创新

数智技术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民族学人类学亦不例外。需明确的是，数智时代不仅未使参与观察法过时，反而使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更具重要性与挑战性。如卡斯特罗（Leesa Costello）等就认为，参与式（主动式）网络民族志学者有机会以一种为网络空间贡献价值并保持叙事连续性的方式开展研究。⑧参与观察通过深度沉浸理解群体文化与意义世界的核心精髓未变，但其“田野点”已从传统物理空间拓展至线上线下交融的混合场域。这要求研究者在汲取数智技术优势的同时，对其局限性保持批判性反思，并据此调整参与观察的实践策略。

一是虚拟田野的“入内出外”。研究者在数字平台（如社交软件、论坛、社群）创建数字身份（头像、账号、昵称），即完成虚拟田野的“初步进入”，但真正的“入内”并非“潜水”旁观，而是通过发帖、直播、评论、分享等互动行为，在深度参与虚拟社区日常实践的过程中“收获喜悦、挫折、反思与灵感”。⑨虚拟田野的“文化习得”同样需要掌握特定的“语言”，除文字或语音外，表情包、“点赞”“转发”“收藏”等均是虚拟社区的符号系统，研究者需理解如特定表情包的情感倾向、转发行为的社交功能等的文化意义，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互动并建立信任。虚拟田野的“出外”，除需如传统田野般抽离具体情境开展理性分析外，还需关注数字场域的特殊维度，如工具好友网络的结构特征、关注与被关注的权力关系、社群的算法推荐机制，以及发布时间、地理位置、设备信息等“数字痕迹”，这些维度是理解虚拟社区行为规范、权力结构与社交资本的关键，也是传统田野中“社会网络分析”在数字场域的延伸。

二是资料采集的“虚实融合”。数智时代的参与观察，在资料采集与记录层面面临“质性与量化融

---

① 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第84页。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③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④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⑤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 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⑥ 麦高登：《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杨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⑦ 朱凌飞：《玉狮场：一个被误解的普米族村庄——关于利益主体话语权的人类学研究》，《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⑧ Leesa Costello, Marie-Louise McDermott and Ruth Wallace, “Netnography: Range of Practices, Misperceptions,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vol. 16, 2017, pp. 1-12.

⑨ Leesa Costello, Marie-Louise McDermott and Ruth Wallace, “Netnography: Range of Practices, Misperceptions,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vol. 16, 2017, p. 9.

合”的挑战。传统田野中的笔记、访谈、影像记录等质性资料，需与数字痕迹（如微博话题热度、社群互动频次）、传感器数据（如研究对象的位置轨迹、活动时长）、平台API接口数据（如用户画像、内容传播路径）等量化数据相结合，才能全面呈现群体的行为模式与文化逻辑。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线上的虚拟田野仍需与线下真实生活相结合，只有同时关注“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逻辑，既观察其线上的组织、动员和话语构建，也参与其线下活动①，才能更大程度地避免“技术黑箱”或“算法偏见”导致的意义流失。②数智技术仅是工具，研究者对真实的“人”的关注与移情，仍是参与观察的核心。

三是研究者的“双栖能力”。数智时代的参与观察，对研究者的能力体系提出了“双栖”要求。一方面需具备传统人类学的核心素养，如同理心、反身性思维与深度沉浸的耐心等，这是理解人类情感与文化意义的基础；另一方面需具备数字素养，能够理解算法逻辑、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如社会网络分析软件、文本挖掘工具）、掌握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规范，同时应对数字场域的特殊伦理问题（如用户隐私保护、数字痕迹的使用边界、算法歧视的影响）。此外，数智时代的参与观察，更需研究者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与开放性，虚拟社群的多元形态、数字文化的快速迭代，要求研究者不断更新认知框架，避免以传统田野的经验简单套用虚拟场域的实践逻辑。只有在传统技能与数字素养的融合中，研究者才能深入数智时代的“他者”世界，理解复杂、鲜活的人性与文化。

综上所述，参与观察法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方法，其“局内”与“局外”的动态平衡逻辑，始终是方法论反思的核心议题。从传统物理田野到数智时代的混合田野，参与观察的场域属性虽已发生变化，但其通过深度参与获取具身体验、通过理性抽离保障分析深度的核心精髓未变。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需持续反思“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张力，在移情与理性、参与与疏离、传统与创新的辩证中，不断推动参与观察法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创新，为理解当代社会文化的复杂性提供更具深度与温度的民族志知识。

（责任编辑：何　频）

① 朱凌飞、孙信茹：《走进“虚拟田野”——互联网与民族志调查》，《社会》2004年第9期。

② 陈奇佳、李昊翔：《概率诗学、算法迷失与内在限度——AI写作的基础性议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6期。